

论语言性别差异与社会文化的互构^{*}

兰 玉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社会文化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语言性别差异,同时语言性别差异诱导和暗示社会文化的变化和发展,语言性别差异和社会文化处于互构的关系中。在语言性别差异和社会文化的互构关系中,后者的作用具有决定和主导的作用,不能夸大前者对后者的建构影响。

[关键词]语言性别差异;社会文化;互构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4-0118-06

一、引言

性别的存在使得人类生存的社会更加多姿多彩,因此有关性别的研究引起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的广泛关注。在语言学领域,早在1922年,O. Jespersen 在其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的文章中就探讨了女性语言和思想的缺陷。真正运用语言学理论对语言性别差异现象进行研究,即把性别语体作为语言的一种变异形式进行研究的是 R. Lakoff, 她的观点集中反映在其1973年发表的 *Women's Place in Language* 中,她认为女性语言本身是男权社会中以男性语言为标准的偏离,与 Jespersen 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女性语言是有缺陷的。之后,D. Zimmerman, C. West 和 P. Fishman 认为女性在社会中受男性的控制和支配,她们的语言遭受“贬值”,她们在谈话常处于被忽略和被动的地位。而 D. Tennen 则认为并不存在男性语言比女性语言优秀,或者男性语言支配女性语言,它们仅仅是风格不同而已,这种不同是由于男女来自不同的亚文化背景(subcultural backdrop)和经历不同的社会化过程造成的。近期关于语言性别差异的新学说是源于学习者如何学习的建构主义理论。此学说理论基础的最早提出者可追溯至 J. Piaget, 他认为,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

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鉴于此,语言学家认为男性和女性并不是如之前学说所认定的那样是预先存在的,语言特征是由性别特征决定的,相反,男人和女人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男性语言和女性语言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实践中像儿童一样“习得”的,并且会根据社会文化结构(大的方面)和话语语境(小的方面)的变化而进行自我调整。这一学说对男人和女人的定义是动态的,与以往观点相比赋予定义变化和发展的内涵,更加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

毫无疑问,语言性别差异的成因有很多,涉及社会、文化、民族、阶级、地域、心理和生理等许多方面,与其相关的还有受教育的程度、职业特征、年龄层次、交际角色关系、话题内容等因素。本文运用建构论的观点探讨社会文化如何建构语言性别差异特征,成为生产性别身份的场所。语言作为反映社会文化现象的一面镜子,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由社会文化决定,不论此现实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人们臆想的(比如,鬼神)。Eckert 和 McConnell-Ginet (1992) 认为语言是客观世界的意识过滤器,它在建构人们关于现实观念,而不仅是以任何显著和直截了当的方式命名现实世界,使用中的语言所建构的客观世界实际上是存在于其他可

* [收稿日期]2007-04-21

[作者简介]兰玉(1982-),女,重庆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

能而未被使用的语言所建构的种种世界图景中的。因此,语言性别差异特征在反映社会文化特征的同时,也在反构社会文化。本文对这一现象也试图作初步探讨。

二、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性别差异的建构

1. 从文化的含义看社会文化结构建构语言性别差异

“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信仰、习惯、目标、制度和技术的总模式。”“文化包括一切人类社会共享的产物,它不仅包括城市、组织、学校等物质的东西,而且包括思想、习惯、家庭模式、语言等非物质的东西。简单地说,文化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邓炎吾,刘润清 1989)语言在这里被认为和他人与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一起,属于文化的一部分。语言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语言在文化这个大家庭里和其他成员紧密联系,并且互相影响。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是:生活在寒冷的北冰洋和加拿大地区的爱斯基摩人自出生之日起就和雪打交道,比如用雪凝成的冰造房子等,雪对其生活有很重要的影响,他们有 8 到 12 种关于雪的名称;而在较温暖地区生活的欧洲人尽管生活也受下雪天气的影响,但与雪的联系不如爱斯基摩人紧密,雪的名称就要少得多;在由炎热地区的人们使用的非洲语言中,则没有关于雪的名称,人们只可以用语言描述这样一种自然现象。因此语言反映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态度,社会文化特征决定人们语言的内容和表达方式,语言不可能脱离人类的社会文化圈而独立存在、发展和变化,社会文化的现状和发展、变化都会在语言的现状和发展变化中得到响应,社会文化建构语言,包括语言中的语言性别差异。

2. 从 sex 与 gender 角度看社会文化建构语言性别差异

在语言性别研究中应该要区分的一对概念就是 sex 与 gender。前者是生理学和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后者是人的社会文化性别,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说的。本文中“语言性别差异”中的“性别”是指的 gender。这种差异是由于“语言使用者出于文化、社会、习俗、修辞等方面的考虑而于特定场合使用的特定用语(杨永志 2002)”而产生的,具有社会文化内涵。而 Cheshire (2002)认为当前人文学科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 sex 和

gender 的二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成立的,因为 sex 所指的对象(即人的生理结构)及其生物学变化过程本身也是人类文化历史的一部分。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说 sex 和 gender 的区分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在需要特别强调是在讨论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的时候,但 Cheshire 的观点至少可以说明即使是生理性别也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并且生理性别的界限在当今发达的社会医疗条件下已经变得模糊。李经纬(2001)指出:“性别是人们实际讲话所产生的一种结果,是人们在参与具体的交际活动中建构而成的”。人们的言语活动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规约,个人的性别取向也同样受制于社会文化的期望,不管其取向是在顺应社会的普遍规则,还是在与社会的价值观相抗衡。“性别是强加于人们用来观察世界的透镜”(李经纬 2001)。这样,女性的含义就是在用社会期望的女性的视角看问题,男性的含义就是在用社会期望的男性的视角看问题。女性和男性在言语发音、词汇选择、话语风格、交际策略等方面都需要在言语活动中根据社会文化的取向进行适时的调整。

3. 社会文化如何建构语言性别差异

Simone de Beauvoir(1986)认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是逐渐形成的。”其实不只女人如此,男人也同样如此。女性语言和男性语言是由可构成性别差异的文化将它们分开来的。以下就社会文化如何建构在言语发音、词汇选择、话语风格、交际策略等方面的语言性别差异提出一些看法。

(1) 社会分工如何建构语言性别差异

人类早期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女性主导社会经济生活,占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较强的体力优势显露出来,他们的劳动由捕鱼、狩猎转向农业和畜牧养殖业,而妇女需要花较多的时间养育子女和操持家务,她们的角色囿于家庭琐事中。这种早期原始分工发展延续至今,当今社会的基本现状是男性在与经济、政治、军事、技术相关的行业中充当主力军,而女性的社会角色多为家庭主妇以及护士、保姆、秘书助理等带有服务性质的职业。在这样的社会分工状态下,男性在谈论与自身职业关系密切、知之较多、较有兴趣的经济、政治、军事及技术方面的话题时强音要多于女性,表明他们对这些话题的自信 and 兴趣,停顿的次数会明显少于女性;而在谈论有关家庭琐事、照顾他人的方式技巧

、处理办公室人际关系等话题时,女性语言比男性语言的强音要多而停顿要少。同时,由于通常由女性在家担负养育和教育子女的责任,在外扮演为他人服务的角色,女性倾向于使用标准优雅的语音形式。这一点在词汇选择上也有所体现,女性所从事的职业和扮演的家庭角色要求她们细心、体贴、富有感情,因而如 *adorable, charming, lovely, divine, marvelous*, “可爱”,“美丽”,“(太)好了”等修饰词和如 *so, never, “真”,“太”* 等强调词多为女性所用,而男性的词汇似乎显得冷冰冰,就事论事,这是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不带有较多的感情色彩相符的。男性的话语风格直截了当,交际中多用陈述句,带命令、要求口吻的祈使句,女性的话语风格则是婉转的,避免使用直接的陈述句和强硬的祈使句,多使用表商量、建议口吻的疑问句以及附加疑问句,富有礼貌情感的含“请”, *please* 的祈使句。由于所从事的职业和扮演社会角色的不同,男性热衷于当前的社会热点话题,女性的话题则通常与家庭事务及自己与他人相关。由于社会分工对语言性别差异的要求,当由女性从事一般由男性从事的职业,或由男性涉足多由女性从事的职业时,个人的语言特征都会因职业和社会角色的影响而发生一定的变化。

(2) 社会权势如何建构语言性别差异

Gal 在其 *Language and Politics Economy and Between Speech and Silence, The Problematics of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Gender* 中指出和其他社会制度和惯例一样,语言也是为占优势的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圣经《创世纪》中关于上帝造人的传说在西方社会文化中奠定了男性强权地位的基础,上帝造了亚当(Adam)为天下第一个男人,而世上第一个女人夏娃(Eve)只是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成的,是亚当的“骨中骨,肉中肉”,男性处于掌控社会权势的地位。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一书中认为自原始时代,中国人的血液中妇女就没有占据过应有的位置。Key (1996) 指出男性和女性的行为只能透过整个社会的权力框架来得以阐释和理解。这样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造成了“男尊女卑”,女性顺从、被动,男性强势、主动的局面,在语言现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男性在发音方式和词汇选择上有更大的自由度和选择权,他们的语音倾向于非标准、低俗的发音方式,比如北京的男青年将“保证”和“反正”发成“保二”和“反二”,在词汇使用上,像 *God damn you! Damn it, hell,*

“他妈的”等禁忌语几乎由男性专用。而女性的语音形式接近于标准,更加高雅,词汇选择更加遵循礼貌原则。笔者认为因为妇女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她们便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为社会文化所推崇的正统的语言形式,试图改变自己既有的社会地位。男性的话语风格和交际策略的核心原则是竞争原则,他们视谈话为一个争夺权力,尔死我活的无形战场,他们喜欢发号施令,威胁吹嘘,随意打断他人的谈话,任意转换话题至对自己有利或感兴趣的话题,较少使用最少回答(*minimal response*)表示自己在聆听或同意对方的观点,因为那样会鼓励对方继续讲下去,这在男性是不情愿的,在由自己掌握话轮(*turn*)时,倾向于把一个话题讲得很仔细,以显示自己的学识、见解和主导地位。而对女性来讲,话语风格和交际策略的核心原则是友好合作原则,谈话是她们借以建立友谊,交流感情的场合。她们谈论日常生活,并富有细腻的感情,用言语增进了解,一般不会直接批评别人,较少打断别人的谈话,较频繁地使用最少回答,如 *yeah, um, “嗯”,“是”* 来表示她们在听和鼓励对方讲下去,“习惯将话题逐步发展,话题之间的转换成渐进性”,“习惯于相互探讨问题,平等交流意见”(杨永志 2002)。在男女共同交谈的场合中,男性打断对方谈话的次数和转换话题的次数要多于女性,在男性对女性所谈话题不感兴趣或不赞成对方观点时,会直抒胸臆,企图控制话题,而女性在此情况下,会等待对方讲述完毕,并紧随对方思路作出反应。可见,男性的社会主导地位使得男性在话语交流中主动、积极、不合作,反映他们支配他人的倾向;而女性“第二性”的社会地位使她们在谈话中被动、消极、合作,反映她们顺从他人的倾向。Crosby 和 Nyquist (1977) 发现, Lakoff 所假设描写的女性的谈话方式同样反映在小孩和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男性的谈话特征中,这进一步说明语言性别差异是在社会权势的作用下动态地建构而成的。

(3) 文化传统如何建构语言性别差异

孔子是儒学的鼻祖,也是中国国学的先祖。中国人至今一直让儒家文化统治着,中国文化很可能还将继续由其统治和垄断。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矣,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即认为女人和小孩一样不好伺候,和他们关系亲密,时时照顾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很贪婪,想要的更多,而当远离他们,不管不问的时候,他们又会心生怨气。孔子的话似在说女人和小孩同是制造麻烦的人。后来孔

子的信徒又派生出一句名言:“女子无才便是德。”在礼教最为盛行的宋朝,女性的行为又被套上了“三从四德”的枷锁。在西方,《圣经》中描写夏娃禁不住诱惑偷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还给亚当吃,违反了上帝的旨令,被逐出了伊甸园,从此人类要忍受自己所犯下的罪孽而带来的苦难。这似又在说女人对人类的苦难应肩负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样的社会文化内容塑造了相对应的性别原型,也就是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行为举止和性别角色的期望,潜在或明文规约什么是适切行为(appropriate behavior)。男性被告知要具有男子汉气概,要强悍,有雄心、进取心,勇于挑战,为权力、事业和名誉奋斗,这些都是积极的、肯定的素质特征,而女性则从小就被提醒要有阴柔之美,要贤淑,要安于平静的生活,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男性在社会生活中通常显得更加自信,更有攻击性,而女性遇事容易退缩,缺乏自信心,并且男性不需要像女性那样保持庄重的形象,因而男性在音量上通常要大于女性。之前的例子(比如禁忌语)也说明在词汇使用上男性语言与文化传统所规定的性别原型一致。父母在子女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按照文化传统的标准培养和教育小孩,“女孩大约在两岁时就开始习得汉语中的‘吧’这一表示礼貌的请求、建议或商量的疑问程度较低的是非问句,而且使用频率很高;而男孩到三岁时才学会‘吧’问句,使用频率很低。(杨永忠 2002)”成年人中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女性由于缺乏自信,在表达观点时更多地使用反意疑问句,经常以疑问、升高的语调结束陈述,显得不够肯定和坚决,经常使用“可能吧”,“也许是”,“我觉得应该是吧”,“I know this sounds silly but...”,“Well, I'm not an expert, but...”,“This may strike you as odd”这类减弱话语力度的话(Chaika 1994),通常以合作友好的态度进行交谈,避免冲突。文化传统塑造了男女不同的性别原型,上面所提到的男性语言和女性语言对不同的话题的偏爱也是其中的表现之一。

社会分工、社会权势与文化传统对语言性别差异的建构是在社会文化的宏观环境和言语行为发生的微观语境中同时交叉进行的,语言性别身份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每一次交际行为对象、目的、谈话主题不同会要求语言性别身份的重新建构,社会文化的变动更是会建构语言性别差异。20 世纪初逐步开展起来的妇女解放运动使得一些妇女为了表明她们的解放,在谈话中故意使用

本由男性专用的禁忌语(Chaika 1994),不能不说社会文化的变动使语言性别差异有了一些局部变化。

三、语言性别差异对社会文化结构的建构

正如 Coates (1997) 指出的那样,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积极地参与到了语言意义的建构中来。语言意义的建构,笔者认为自然包括语言性别差异的建构,语言性别差异本身带有语言意义,这种语言意义是由于语言使用者生理、心理及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语言使用方式造成的。辜正坤(2004)总结归纳出人类文化演进的九大规律,其中之一就是语言文字纵向诱导暗示律。顾名思义,语言文字诱导和暗示着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他认为:“文化中最伟大的成就是人的语言文字。别的因素消逝、消失的可能性较大,但语言文字相对来说,存活期较长,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人存在,它就会一直存在;它具有稳定的特征,其基本模式(如语法规则和文字等)可以上千年甚至数千年不发生根本的变化,因而对人类文化也具有相应稳定的影响。”语言性别差异不是单方面受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社会文化拟语言,语言也在同时反构拟社会文化结构。极端的 Sapir-Whorf 假说认为不同的语言构拟了不同的社会文化世界,因而不同的语言使用者看到的不会是同一社会文化世界。这一说法引起了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争议,但人们在语言对人类认识世界有影响这一点上基本达成共识。人们使用语言所描述的那个世界无论多么客观,不受人的主观感受的影响,那个世界都是通过人的语言描述所认识到的世界,受到人的意识能力的限制。人类在通过语言认识世界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文化互动,对人类生存环境和人类自身进行改造,从而达到建构社会文化结构的目的,因而语言(包括语言性别差异)可以通过人自身的活动达到建构社会文化结构的目的。

语言性别差异对社会文化结构的建构是以一种潜移默化方式进行的,通常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影响人们的思考方式、行为方式和建构社会文化的方式。Ochs (2002) 归纳出与文化能力社会化密切相关的四个社会背景因素,即在开展社会文化活动时,人必须要有能力知晓在进行的是什么行为(Actions),自己或其他参与者在实施该行为时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姿态(Stances, 包括情感和认知姿态),体现的是什么社会身份(Identities)以及

这个行为是什么社会活动(Activities)的一部分。这四个因素是紧密联系、互相依赖的,一定的社会成员的行为与姿态相联系,行为与姿态又与社会身份和社会活动紧密联系。Ochs(1996)用以下的图式来解释它们的关系:

Actions ∪ Stances
 Actions ∪ Stances ∪ Identities
 Actions ∪ Stances ∪ Activities
 Activities ∪ Identities

社会活动和社会身份要比行为和姿态复杂得多,后者是前者的文化建构材料。进而 Ochs(2002)指出语言意义形式是通过构建行为和姿态来间接地指引社会活动和社会身份的。

Linguistic Form Stances Activity
 Actions Identity

语言性别差异在人类每一次具体的实践行为中起作用,影响语言使用者和其他该行为参与者的情绪、态度、感受和信念,而这些行为和姿态如上面所讲,建构着社会活动和社会身份,即建构了社会文化结构。

在实际行为中,女性普遍倾向于使用标准高雅的语体,容易接受新出现的有较高声望的语言形式,Labov(1990)据此认为她们通常会社会语言的革新者,她们的语言行为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性别的差异和特征对文化价值观念的构建大多数情况下来自语言。法国女权主义者 Moi(1985)认为,语言不仅是命名标记客观世界、人们交流的系统,还是人类实施权力,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得以生产的场所。一般来说,男性的语音比女性铿锵有力,喜欢谈论经济、政治、技术、军事和社会热点问题,给人知识面广,掌握较多的专门技术,有事业心和较好的个人发展前途的刻板印象,被认为能够承担艰巨任务,遇事冷静;而女性讲话温文尔雅,谈论的话题多属于家庭生活细节,或是人际关系等琐事,人们对女性的定位多是家庭主妇,“头发长,见识短”,知识面狭窄,容易情绪化,不能担当大任;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有新颖的见解,由于她们的表达方式和人们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她们如不经过一番努力,也较难受到或得不到和男性观点同等的重视。因此女性领导者如要想更有效地实施命令,使下属信服,就必须改变原有的温柔、纤细的嗓音,温和、优雅的说活风格。Coleridge 曾说过:“The truth is, a great mind must be androgynous.”也就是说,要想成功,人们

必须要适时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语言性别特征来讲,应该将男性语言和女性语言优秀的因素结合起来,时而表现得积极、自信、强势,时而表现得温柔、体贴、谦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社会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印象。

四、结语

语言本身是中性的,它的性别差异内涵是在使用过程中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语言性别差异反映的是社会文化的性别价值观对男性语言和女性语言期望的差异。如同“鸡生蛋,蛋生鸡”一样,社会文化建构语言性别差异,语言性别差异也在反构社会文化结构。语言性别差异可以与社会文化的期望一致,顺应当前的社会文化期望,也可以与之相悖,根据具体的交际事件、目的、对象采取新的言语发音方式、词汇选择方式、话语风格、交际策略,从而重建社会文化结构。可见语言性别差异与社会文化结构是处于互构的关系中的。然而不可片面夸大语言性别差异对社会文化结构的作用,两者中起主导决定作用的是社会文化结构。如果绝对化语言性别差异的影响,认为语言性别差异有超乎自然力的神秘力量,能够主宰人的命运,彻底改造社会文化的结构,那便有语言拜物教的危险。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展起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取缔了一些带有性别歧视的语言,如用 chairperson 代替 chairman,用 fireperson 代替 fireman,修正男性人称代词的泛化使用,在泛指场合用 he/she, him/her 或 they/their/them 代替 he/him。但 Fasold(1988)发现这些新词在实际使用中受到抵制,未被使用或未被解释为正面的意思,有试验显示男性人称代词和泛指人称代词的使用在受试者头脑中所产生的图像并没有明显区别,并且男性的图像比女性图像出现的次数多而明显。看来在一个性别歧视仍然存在的社会里,企图通过消除性别歧视性语言来达到改变人们的性别歧视观念的目的是不可能的。Cameron(1985)就曾说:“In the mouth of sexist, language can always be sexist.”同样的道理,语言性别差异对社会文化结构的建构不能扩大化,其影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的,而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Cameron, D. 1985. *Feminism and Linguistic Theory* [M]. London, Macmillan.

- [2]Cheshire, J. 2002. Sex and Gender in Variationist Research [A]. In J. K. Chambers, Peter Trudgill & Natalie Schilling-Estese (eds.),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C].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423-443.
- [3]Chaika, Elaine. 1994. *Language, The Social Mirror* [M]. 3rd ed. Boston, Heinle & Heinle Publishers.
- [4]Coats J. 1997. Competing discourses of femininity [A]. In Helga Kotthoff & Ruth Wodak (eds.), *Communicating Gender in Context*[C].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85-314.
- [5]Crosby, F. & Nyquist, L. 1977. The female register: An empirical study of Lakoff's hypotheses [J]. *Language in Society* 6, 163-189.
- [6]Eckert, P. & McConnell-Ginet, S. 1992. Think Practically and Look Locally; Language and Gender as a Community-Based Practice [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1, 461-90.
- [7]Fasold, R. 1988. Language Policy and Change, Sexist Language in the Periodical News Media [A]. In P. Lowenberg (ed.), *Language Spread and Language Policy* [C].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8]Gal, S. 1989. Language and Politics Economy [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8, 345-67.
- [9]Between Speech and Silence; The Problematics of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Gender [A]. In M. di Leonardo & M. Berkeley (eds.), *Gender at the Crossroads of Knowledge* [C].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0]Key, Mary Ritchie. 1996. *Male/Female Language; With 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M]. 2nd ed. Lanham, Md., & London: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 [11]Labov, William. 1990. The Intersection of Sex and Social Class in the Course of Linguistic Change [J].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2, 205-54.
- [12]Moi, T. 1985. *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M]. London: Methuen.
- [13]Ochs, E. 2002. Becoming a speaker of culture [A]. In Claire Kramsch (e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Socialization;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C].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99-120.
- [14]Linguistic resources for socializing humanity[A]. In J. J. Gumperz & S. C. Levinson (eds.), *Rethinking Linguistic Relativ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07-37.
- [15]波伏娃·西蒙. 第二性[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 [16]邓英晋, 刘润清. 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 [M]. 北京,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1989.
- [17]辜正坤. 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 [18]李经纬. 西方语言与性别研究述评[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 (1), 11-15.
- [19]杨永忠. 论性别话语模式[J]. 语言教育与研究, 2002, (2), 56-65.

(责任编辑:朱德东)

On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gender differences and social culture

LAN 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Social culture, in people's practices and activities, constructs language gender differences, meanwhile, language gender differences induces and hints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culture, h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gender differences and social culture is mutual construction. In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gender differences and social culture, the latter has leading and decisive role, and the role of the former should not be exaggerated on construction influence on the latter.

Keywords: language gender differences; social culture; mutual construction